

唐代制诰文改革与古文运动之关系

鞠 岩

唐人将“代拟王言”视为润色鸿业的不朽盛事，对制诰文的文学性也极为看重。然而自六朝以来，朝廷各类公文皆用骈体写就，已成为惯例。由贾至所开启的制诰文散体化改革，经常袞、崔元翰、陆贽、权德舆等人的努力，在元稹、白居易手中获得成功，并由庞严、封敖、杜牧、钱珣等人承继，一直延续至唐末。由于唐代制诰文是文体文风自上而下施加影响的重要渠道，所以这一改革本身既是古文运动的一项重要成果，同时也以制诰文特有的方式影响了当时的文体文风，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了古文写作。

六朝以降，朝廷诏令文书率用骈体，因而唐代制诰文历来被归入骈文一类。陈寅恪发千古之覆，首次指出元稹、白居易的制诰文改革实为古文运动之一大成果^①。其后学者多赞同此说，但对制诰文改革的讨论仅局限于元、白二人，尚无论者全面论述唐代制诰文革新与古文运动的关系。本文拟在探讨唐人制诰观的基础上，考察唐代制诰文改革的发展与影响，进而探讨其与古文运动的关系。

一、唐人制诰观

《唐六典》卷九中书省中书令条云：“凡王言之制有七：一曰册书，二曰制书，三曰慰劳制书，四曰发日敕，五曰敕旨，六曰论事敕书，七曰敕牒。”^②七类“王言之制”习惯上统称制诰文^③。在今天看来，制诰文系朝廷公文，多数千篇一律，程式化严重，文学性不高。但在唐代文人眼中，制诰文具有崇高的地位。

唐人将“代拟王言”视为润色鸿业、焯叙盛明的不朽盛事。《文心雕龙·诏策》云：“夫王言崇秘，大观在上，所以百辟其刑，万邦作孚。”^④王言为天子所发布的政命，诸侯效法，万国景仰，其庄严崇高的政治地位，自然会让士人对其重视万分，自古而然。唐代文人将撰写制诰、“代天

子言”视为极高的荣誉。代宗、德宗之际的著名文士于邵,在《与萧相公书》中说:

窃以圣上建元立极之初,每赐驱策,虽无尘露之效,颇传润色之美。有册皇太后尊号、圣神文武尊号、皇储宜建之制,皆泥金检玉,著之国史。其余则北蕃西戎,诏册文诰,无大无小,何密何疏,侯王将相,出入中外,数年之间,事无虚日,皆承特旨,俾以发挥。声猷所浹,必由是也。岂惟叨窃之幸,实为不朽之幸矣。昔隋文帝谓杨素、牛宏曰:“薛道衡老矣!宜使朱门列戟。”薛公谢恩,且辞无功。隋文帝诏曰:“自吾有宝位,国家大事,皆尔宣行,岂非大功耶?”薛公乃受赐。愚虽才不逮薛,而焯叙盛明,过于薛远矣。^⑤

从册皇太后、上尊号、建皇储等“著之国史”的册文,到诏册戎狄的文诰,再到各类命官制书,凡涉及时政最核心问题的大诏令,于邵都曾参与撰拟。对此,他极为自负,以为润色鸿业、“焯叙盛明”之功,远过于隋代著名文人薛道衡,并认为自己所撰制文,“颇传润色之美”,“实为不朽之幸”,可以流传万世。再如权德舆评价陆贽的公文曰:“其关于时政,昭昭然与金石不朽者,惟《制诰》、《奏议》乎!”^⑥也把陆贽制诰文看作不朽之盛事。于邵和权德舆的看法很能代表唐人的观点。此外,自西汉至南朝,制诰文的文学性愈来愈受重视,至唐代发展到极致,对王言的文采要求很高,文人也以“掌书王命”为荣。唐人对制诰文文学性的看重,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。

(一)唐代制诰文的主要草拟者是中书舍人和翰林学士。唐初设中书舍人六员,主要职作为起草和进画制敕。高宗、武则天时期,中书省地位上升,中书舍人“侍奉进奏”的职掌逐渐发展为参议表章,获得裁决政务的职权^⑦,在中枢政局中的作用愈加重要。杜佑《通典》卷二一《职官三》中书省中书舍人条云:“自永淳以来,天下文章道盛,台阁髦彦,无不以文章达。故中书舍人为文士之极任,朝廷之盛选,诸官莫比焉。”^⑧这足以说明唐代中书舍人的政治、文化地位之高。开元二十六年(738),玄宗建学士院,置翰林学士。其后翰林学士的政治地位迅速提升,逐渐侵夺了中书舍人的部分草诏权,主要撰拟意义重大的“内制”。因此,翰林学士在唐代士林中享有极高的清誉,被赞为“天上人”^⑨。然而,翰林学士地位的迅速上升,并未导致其完全取代中书舍人。相反,“在玄、肃两朝,中书舍人,其政治声望与文学声誉,是大大超过这一时期的翰林学士的”^⑩。即使在翰林学士地位极高的中唐后期和晚唐,中书舍人仍为士人所看重。唐代中书舍人与翰林学士,都是享有很高政治声望与文学声誉的士人群体,由他们来撰拟的制诰文,自然讲究文采,受士林推重。《旧唐书·孙逖传》云:“逖选贡士二年,多得俊才……后年拔李华、萧颖士、赵骅登上第,逖谓人曰:‘此三人便堪掌纶诰。’”^⑪孙逖以擅长制诏闻名,有心通过科举考试选拔适合撰写制诰的人才,所举三人,后来虽无机会掌诏诰,但都成为著名文士,萧颖士、李华还相继成为玄、肃之际的文坛盟主。可见唐人对掌纶诰者文才要求之高。再如白居易《元稹除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赐紫金鱼袋制》云:“吾精求雄文达识之士,掌密命,立内廷。甚难其人,尔中吾选。”^⑫常衮《授郗昂知制诰制》云:“郗昂,冲和简朴,不饰其外;有雄俊之才,可变风雅;有精深之学,实究儒元。”^⑬明确要求掌诰命者需有“雄文达识”、“雄俊之才”与“精深之学”。

(二)中书舍人和翰林学士之中,因擅长制诰而被誉为“大手笔”者代不乏人。初唐有颜师古、岑文本、李峤、崔融等。《旧唐书·颜师古传》:“于时军国多务,凡有制诰,皆成其手。师古达于政理,册奏之工,时无及者。”^⑭《旧唐书·岑文本传》:“文本所草诏诰,或众务繁凑,即命书僮六七人随口并写,须臾悉成,亦殆尽其妙。”^⑮《旧唐书·李峤传》:“则天深加接待,朝廷每有大手笔,皆特令峤为之。”^⑯盛唐时期制诰文领域更是名家辈出。《旧唐书·许景先传》:“自开元初,景先与中书舍人齐澣、王丘、韩休、张九龄掌知制诰,以文翰见称。”^⑰《旧唐书·贾曾传》:“与苏晋

同掌制诰,皆以词学见知,时人称为苏贾。”^⑧《旧唐书·席豫传》:“与韩休、许景先、徐安贞、孙逖相次掌制诰,皆有能名。”^⑨《旧唐书·孙逖传》:“逖掌诰八年,制敕所出,为时流叹服。议者以为自开元已来,苏頲、齐澣、苏晋、贾曾、韩休、许景先及逖,为王言之最。”^⑩《唐诗纪事》卷一七:“唐人咸推(苑)成为文诰之最。”^⑪中唐以后,则有杨炎、常袞、于邵、令狐楚、李德裕等人。《旧唐书·杨炎传》:“与常袞并掌纶诰,袞长于除书,炎善为德音,自开元已来,言诏制之美者,时称常、杨焉。”^⑫《旧唐书·于邵传》:“当时大诏令,皆出于邵。”^⑬《旧唐书·李德裕传》:“禁中书诏,大手笔多诏德裕草之。”^⑭《新唐书·令狐楚传》:“其为文,于笺奏制令尤善,每一篇成,人皆传讽。”^⑮每一时期的王言能手都为士人所津津乐道,被广泛地评论和称誉,足见唐代文人对制诰文的看重。

(三)唐人对“大手笔”所撰制诰的文学性也有很高评价。玄宗时中书令张说称赞中书舍人许景先道:“许舍人之文,虽无峻峰激流崭绝之势,然属词丰美,得中和之气,亦一时之秀也。”^⑯所谓“属词丰美,得中和之气”,正是对其制诰文典赡雍容风格的评价。白居易《冯宿除兵部郎中知制诰制》云:“吾闻武德暨开元中,有颜师古、陈叔达、苏頲称大手笔,掌书王命。故一朝言语,换成文章。”^⑰他认为颜师古、陈叔达、苏頲的制诰“换成文章”,有很高的文学成就。苏頲是盛唐时期最负盛名的制诰大家,其制诰文也最受唐人称许。《新唐书·苏頲传》云:“玄宗平内难,书诏填委,独頲在太极后阁,口所占授,功状百绪,轻重无所差。书史白曰:‘丐公徐之,不然,手腕脱矣。’中书令李峤曰:‘舍人思若涌泉,吾所不及。’”^⑱苏頲文思之敏捷,令“大手笔”李峤叹服。与苏頲同时的制诰名家韩休,在为苏頲文集所作序文中赞叹道:“若乃天言焕发,王命急宣,则翰动若飞,思如泉涌,典谟作制于邦国,书奏便蕃于禁省,敏以应用,婉而有章,则近代以来,未之前闻也。岂学而得之欤?抑亦天纵之欤?何其殊尤而懿铄也!”^⑲指出苏頲制诰文除文思敏捷外,也“婉而有章”,富于文采。李德裕《文章论》云:“近世诰命,惟苏廷硕叙事之外,自为文章,才实有余,用之不竭。”^⑳这是指苏頲制诰文在叙述朝廷政令的同时,也极具文学性,即使脱离了当时的政治环境,也还有很强的可读性,足以流传后世。此外,唐人还进一步探讨制诰文的文体特点。杨嗣复《丞相礼部尚书文公权德舆文集序》认为,真正的“王者之言”应“无诞词,无巧语,诚直温润”^㉑,权德舆就达到了这一要求。钱翊对自己多年的草诏经验加以总结,在自编制诰集《舟中录》的序文中指出,制文应“体正而有伦,辞约而居要,始终明白”,且“国朝声名辞臣,率能由是而作”^㉒,表现了对制诰文文体特征的深入思考。

(四)唐人对制诰文的重视还表现在文集的编纂方面。唐代出现了大量的制诰别集。唐代文人撰写制诰,系“代拟王言”,制诰在下达之时,名义属于皇帝。而且,朝廷诏命属于政治机密,在颁布之前严禁泄露。《唐六典》明确记载中书舍人起草制敕,“其禁有四”,第一条就是禁“漏泄”^㉓。因此,制诰别集在初唐并未出现。最早将制诰文编为专集的大概是苏頲。《旧唐书·苏頲传》载玄宗谓頲曰:“卿所制文诰,可录一本封进,题云‘臣某撰’,朕要留中披览。”^㉔韩休为苏頲文集所作序文也记载此事:“今上尝谓公曰:‘朕每见卿文章,与诸人尤异,当令后代作法,岂惟独称朕心?’”^㉕玄宗极为欣赏苏頲所撰制诰,遂特命其编纂,不但要“留中披览”,亦且“令后代作法”。这既是对苏頲制诰文的极高评价,同时很可能也就此开启了唐人编纂制诰专集的风气。《新唐书·艺文志四》集部别集类著录唐人制诰专集19种:常袞《诏集》六十卷,杨炎《制集》十卷,苏弁编,权德舆《制集》五十卷,武儒衡《制集》二十卷,段文昌《诏诰》二十卷,郑畋《玉堂集》五卷,《凤池稿草》三十卷,《续凤池稿草》三十卷,吴融《制诰》一卷,陆贽《翰苑集》十卷,韦处厚纂,王仲舒《制集》十卷,李虞仲《制集》四卷,封敖《翰稿》八卷,崔嘏《制诰集》十卷,独孤霖《玉堂集》二十卷,刘崇望《中和制集》十卷,李蹊《制集》四卷,钱翊《舟中录》二十卷,薛延(按

当作廷珪《凤阁书词》十卷^⑤。陈尚君《〈新唐书·艺文志〉补——集部别集类》补录两种：刘卹《翰苑集》一卷、《凤池刀笔》五卷^⑥。张固也《新唐书艺文志补》集部别集类又补录两种：《元稹制集》二卷、李绅注、韩愈《西掖雅言》五卷^⑦。据现存资料可知，权德舆《制集》五十卷为其生前亲自纂录^⑧，《舟中录》也为钱珙亲手编理^⑨，陆贽《翰苑集》除上列韦处厚纂十卷本外，尚有权德舆编的二十四卷本^⑩。此外，李德裕于大中元年（847）将其在武宗朝所作制诰编为《会昌一品制集》二十卷^⑪。那么，我们现今可知的唐人制诰专集有24种。仅据两《唐书》进行初步统计，唐代任中书舍人或他官知制诰者约四百余人，据傅璇琮《唐翰林学士传论》，唐代翰林学士计二百余人。虽然中书舍人与翰林学士在人员上有一定数量的重出，但二者相加仍然是个庞大的数字。上文已提到，唐代任中书舍人与翰林学士者多为一时知名文士，制诰能手又层出不穷，将所撰制诰编为别集单行者必不在少数。因此，我们有理由推论，此处所罗列的24种唐人制诰专集不过是冰山之一角，尚有大量的制诰别集流传当时，而今已湮没不可考。此外，唐人还编选了不少制诰总集。据卢燕新《唐人编选唐文总集辑考》，唐人编选通代制诰总集两种：温彦博《古今诏集》三十卷、李义府《古今诏集》一百卷；唐五代人编选唐代制诰总集有刘允济《金门待诏集》十卷、李麟《制集》五十卷、佚名《唐德音录》三十卷、佚名《元和制集》十卷、马文敏《王言会最》五卷等21种^⑫。数量如此之多的制诰别集和制诰总集的出现，最足以说明制诰文在唐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。这些文集在唐代文人中广为流传，必然对当时的文章写作产生影响。

（五）唐人对制诰文的重视还表现于制诰文在各类文体中的地位。权德舆《唐赠兵部尚书宣公陆贽翰苑集序》云：“公之秉笔内署也，擢古扬今，雄文藻思，敷之为文诰，伸之为典谟，俾僇狡向风，懦夫增气，则有《制诰集》一十卷。览公之作，则知公之为文也。”^⑬在制诰、奏议、诗、文、赋、表、状各类文体中，权德舆最看重陆贽的制诰，将其列于首位，认为足以代表陆贽的文学成就。权德舆为贞元文坛盟主，主持风雅多年，他的观点很具代表性，说明在唐人看来，制诰文在各类文体中占据极高的地位。

以上，我们试图还原唐人制诰观。在此基础上，可以推论，唐代制诰文对当时文体文风产生影响的方式至少有二：

（一）唐代凡是涉及重大政治事件的制诰，都要布告天下。如贾至《明皇令肃宗即位诏》末云：“布告亿兆，咸使闻知。”^⑭常衮《减淮南租庸地税制》：“宣示百姓，知朕意焉。”^⑮《大历七年大赦天下制》：“敕书日行五百里，宣示中外，咸使闻知。”^⑯陆贽《奉天改元大赦制》：“敕书日行五百里，布告遐迩，咸使闻知。”^⑰元稹《处分幽州德音》：“宣示中外，宜体朕怀。”^⑱黎民百姓无不知晓，士大夫更是熟知其文。制诰文这一特有的政治地位与政治功用，使得它具备其他文体所没有的巨大影响力。可以说，制诰文在文体文风上的些许变化，都会令天下士人瞩目。因此，唐代制诰文是文体文风自上而下施加影响的重要渠道。

（二）由于唐人将“代拟王言”视为不朽盛事，对制诰文的文学性极为看重，将一些制诰名家誉为“大手笔”，制诰文在各类文体中占据很高的地位，同时又有大量的制诰别集、总集流行于世，因此，从文学自身传播与发展的角度来看，制诰文在文学领域内有很大影响，其在文体文风方面的改革不仅仅局限于朝廷公文，而是会显著地影响到其他各类文体。这是我们探讨唐代制诰文改革与古文运动关系的立论基础。

二、唐代制诰文改革进程与古文运动

唐代制诰文改革的先驱者贾至，也是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之一。在盛唐社会由盛转衰的过

程中,古文运动先驱萧颖士、李华、贾至、独孤及等人先后走上文坛,提倡古文,力图挽救时弊。他们中惟一有机会草拟制诰的是贾至。安史之乱前后,贾至依据他所秉持的儒家思想和宗经复古的文学观念,积极参与政治,并利用中书舍人掌书诰命的职权,撰写散体制诰,提倡文体复古,以期达到儒学复兴的目的。他在内容、语言形式和风格等方面对制诰文进行了初步改革。独孤及《祭贾尚书文》说:“文章陵夷,郑声夺伦。兄于其中,振三代风。复雕为朴,正始是崇。学者归仁,如川朝宗。六义炳焉,自兄中兴。”^②代拟王言的制诰要“布告亿兆,咸使闻知”,故而影响极大。贾至所作制诰,凡是涉及重大政治事件、有广泛影响的,大都采用散体或骈散结合的形式,可见是有意识地将此作为文体复古的手段。因此,他对制诰文进行的复古改革,其影响或许并不在广收门徒的萧颖士、李华之下。关于贾至制诰文改革与古文运动的关系,笔者另有专文论述^③。

贾至的改革显然对其后制诰文写作产生了一定影响。虽然制诰仍以骈体为宗,但有一些王言名篇开始出现散化倾向。代宗朝翰林学士、中书舍人常袞《授庾准杨炎知制诰制》云:“诏令之重,润色攸难,其文流则失正,其词质则不丽。固宜酌风雅之变,参汉魏之作,发挥纶旨,其在兹乎?”^④虽然认为诏令在辞藻上应求“丽”,但同时也主张学习“汉魏之作”,体现出一定的复古倾向。常袞所作制诰多为骈体,但《萧昕等分祭名山大川制》、《减征京畿丁役等制》、《放京畿丁役及免税制》、《大历四年大赦天下制》、《大历五年大赦天下制》等若干重要制文则骈散结合,最典型的是《大赦京畿三辅制》:“顷者鱼朝恩夙有勋勋,委之戎事,而征求黎庶,空竭闾阎。加之广有贸易,夺人贿赂;京城之内,擅致刑狱;恣行忍虐,幽执无辜……恶稔叠盈,自婴沉痾。”^⑤揭发鱼朝恩的种种罪行,包含着作者个人的爱憎,有异于一般的例行公文,虽句式整齐,但文辞质朴,不用骈体。常袞撰写部分重大诏命以散体为主、骈散结合的做法,应是受贾至影响。

德宗朝曾任职方员外郎、知制诰的崔元翰,与古文家交游密切。他师事独孤及,又曾于贞元八年(792)与梁肃共同举荐韩愈、李观、欧阳詹等登第。他本人也颇多复古论调,《与常州独孤使君书》主张“绍三代之文章,播六学之典训”,不满于“后世之文,放荡于浮虚,舛驰于怪迂”^⑥。《旧唐书·崔元翰传》说他的对策、奏记、碑志等文体,“师法班固、蔡伯喈,而致思精密”,即学习汉代文章又有所发展。至于他最擅长的制诰,今已无存,但从《旧唐书》本传“诏令温雅,合于典谟”^⑦的记载,可以推知其制诰文大抵也是师法汉魏,有复古倾向。

德宗朝翰林学士陆贽,对骈体公文进行了散化改造。朱泚之乱中,德宗出幸奉天,于兴元元年(784)正月颁布《奉天改元大赦制》,制文即出于陆贽之手。此文写作背景与贾至《玄宗幸普安郡制》类似,其主旨是开诚罪己,以德宗的口吻自责:“长于深宫之中,暗于经国之务。”“不知稼穡之艰难,不察征戍之劳苦。”“天谴于上而朕不悟,人怨于下而朕不知。”“朕实不君,人则何罪。”^⑧坦率恳切,感人至深。这是继贾至《玄宗幸普安郡制》之后,唐代帝王所发布的又一篇罪己诏,都由掌诰命的文臣来起草,其精神实质是一脉相承的。陆贽制文代皇帝自责之深,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,因此诏书下达之后,“虽武人悍卒,无不挥涕激发”^⑨,叛乱得以平息,实有赖于此。这篇制文虽为骈体,但不隶事用典,不加藻饰,以浅近平实之语言曲尽议论,可称为散化之骈体。陆贽的其他制诰、奏议等公文大都用此体写就。这种文体既有骈文之优美,复具散文之流畅,虽未突破骈文的范围,但已与传统骈文的面貌大不相同。权德舆说陆贽所草制词“洒翰即成”,“初若不经思虑,及成而奏,无不曲尽事情,中于机会,仓卒填委,同职者无不拱手叹伏,不能复有所助”^⑩。正显示了这种改造后的文体曲尽议论的优点。

权德舆贞元十年(794)为起居舍人、知制诰,后官至中书舍人,“凡四任九年,专掌诏诰”^⑪。

他论文颇有复古倾向,《唐故尚书兵部郎中杨君文集序》云:“周家忠厚,文章备乎二代,先师有郁郁之叹,故周任、史克、仍叔、吉甫之伦生焉。汉氏划烦苛,宏利泽,训辞深厚,议论宏大,故贾谊、扬雄、司马迁、相如之才出焉。”^④推崇三代两汉之作。其制诰文几乎散佚殆尽^⑤,曾任中书舍人的李直方在《祭权少监文》中评价说:“载领丝言,粉泽天工。词简理诣,灿然昭融。俾国家诏命,上逾十代,与周汉同风。”^⑥可见权德舆的制诰之作也有很明显的复古特征。权氏于贞元、元和间掌文柄,是当之无愧的文坛领袖^⑦。他生前曾自编《制集》五十卷,在士人中流传,这无疑会宣扬文学复古观念,推广古文写作。

虽然自贾至而后,对制诰文的散化改革从未间断,但这些改革并未使制诰完全突破骈体的范畴,也并未大张旗鼓地进行,因而很容易被后人忽视。直到韩、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蔚然兴起之时,制诰文的阵地仍然被骈文所占据。元和十五年(820)五月,元稹迁祠部郎中、知制诰,开始改革制诰。十二月,白居易迁主客郎中、知制诰,响应元稹的号召,也以散体撰写制诰。长庆元年(821)二月,元稹迁中书舍人、翰林承旨学士,十月,白居易转中书舍人,继续推行制诰改革。元稹《制诰序》云:

制诰本于《书》。《书》之诰、命、训、誓,皆一时之约束也。自非训导职业,则必指言美恶,以明诛赏之意焉。是以读《说命》,则知辅相之不易;读《胤征》,则知废怠之可诛。秦汉已来,未之或改。近世以科试取士文章,司言者苟务润饰,不根事实,升之者美溢于词,而不知所以美之之谓;黜之者罪溢于纸,而不知所以罪之之来,而又拘以属对,踟以圆方,类之于赋、判者流。先王之约束盖扫地矣。元和十五年,余始以祠部郎中知制诰,初约束不暇,及后累月,辄以古道干丞相,丞相信然之。又明年,召入禁林,专掌内命。上好文,一日,从容议及此,上曰:“通事舍人不知书便其宜,宣赞之外无不可。”自是司言之臣,皆得追用古道,不从中覆。然而余所宣行者,文不能自足其意,率皆浅近,无以变例。追而序之,盖所以表明天子之复古,而张后来者之趣尚耳。^⑧

开宗明义,表明其制诰文改革即效法《尚书》的诰、命、训、誓,宗经复古。进而指出近世制诰的弊端,即内容上空洞浮泛,形式上多用骈体。最后讲述其制诰文改革的经过,即在穆宗皇帝和宰相段文昌的支持下大张旗鼓地展开,欲转移一时之风气,而示来者以轨则。这篇《制诰序》从理论讲到实践,堪称中唐制诰文改革之纲领。

那么,元稹究竟在何等程度上实施了这一纲领呢?元稹制诰今存一百五十余篇,绝大多数以散体为主,间有骈句,如《崔郾授谏议大夫》:“昔我太宗文皇帝以魏徵为人镜,而奸胆形于下,逆耳闻于上。及徵没,而犹叹过失之不闻。夫以朕之不敏不明,托于人上,月环其七,而善恶蔑闻。岂谏诤之臣未尽规于不德耶?朕甚惧焉!以尔郾端厚诚明,济之文学,柔而能立,谦而逾光,命汝弼予,式冀无过。於戏!宋景公一诸侯耳,而陈星退之词;齐威王独何人哉,能辨日闻之佞。尔其极谏,朕不漏言。”^⑨内容充实,名为任命谏官的制文,更类似于一篇劝君主纳谏的奏疏,形式上古朴晓畅,偶然出现用典的骈句,也无滞碍之感。可以说,元稹的多数制诰都达到了他在《制诰序》中所提出的要求。

白居易是这一改革的积极参与者和鼓吹者,他在《元稹除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赐紫金鱼袋制》中说:“能芟繁词,划弊句,使吾文章言语与三代同风,引之而成纶綍,垂之而为典训。凡秉笔者,莫敢与汝争能。”^⑩在为元稹所作墓志铭中也说:“制诰,王言也,近代相沿,多失于巧俗。自公下笔,俗一变至于雅,三变至于典谟。时谓得人。”^⑪对元稹改革制诰的功绩加以赞誉。白

居易于元和年间任翰林学士,其所撰制诰皆为骈体,自元稹号召制诰文改革之后,白居易积极响应,开始撰写散体制诰。《白居易集》“中书制诰”有“旧体”、“新体”之分,“旧体”即改革后的制诰文,与元稹制诰同调。限于篇幅,此处不加举证。

元、白二人的制诰文改革,从内容到形式,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,是古文运动的一项重要成果。与之形成对比的是,作为古文运动领袖的韩愈,于元和九年(814)十二月任考功郎中知制诰,十一年正月迁中书舍人,五月降为右庶子,有一年半的时间掌草诏权。其所撰制诰,现仅存《除崔群户部侍郎制》^⑧,此文系严整的骈体。此外,也未有资料表明韩愈曾对制诰文进行过任何改革。由此可见,以骈体撰写制诰的传统是多么强大,而元稹进行制诰改革是多么不易。陈寅恪说:“唐代古文运动巨子,虽以古文试作小说,而能成功,然公式文字,六朝以降,本以骈体为正宗。西魏北周之时,曾一度复古,旋即废除。在昌黎平生著作中,《平淮西碑》文乃一篇极意写成之古文公式文字,诚可称勇敢之改革,然此文终遭废弃……惟就改革当时公式文字一端言,则昌黎失败,而微之成功,可无疑也。至于北宋继昌黎古文运动之欧阳永叔为翰林学士,亦不能变公式文之骈体。司马君实竟以不能为四六文,辞知内制之命。然则朝廷公式文体之变革,其难若是。微之于此,信乎卓尔不群矣。”^⑨通过韩愈失败、元稹成功之比较,盛赞元稹改革公式文字的气魄与功绩。

由于元稹的改革是在皇帝和宰相的支持下进行的,元、白二人所作散体制诰的数量又极为可观,故而在当时影响极大。《旧唐书·元稹传》说:“辞诰所出,奄然与古为侔,遂盛传于代。”^⑩《新唐书·元稹传》也说:“变诏书体,务纯厚明切,盛传一时。”^⑪白居易《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》诗曰:“制从长庆辞高古。”自注云:“微之长庆初知制诰,文格高古,始变俗体,继者效之也。”^⑫可见其不但盛传一时,而且为后继者所效仿。傅璇琮指出:“中晚唐时,不论是翰林制诰、中书制诰,都出现骈散结合、文词流畅的新风,尤其如穆宗后期庞严,武宗时封敖,宣宗时杜牧,更为突出。这对宋代的制诰撰写也很有影响。”^⑬我们可沿这一线索考察元白制诰改革的影响。

庞严于穆宗长庆年间任翰林学士,其所撰制诰今已无存。《旧唐书·元稹传》载:“后进之士,最重庞严,言其文体类己,保荐之。”^⑭据此,庞严应是元稹制诰改革的追随者,模仿元稹撰写散体制词,因而受到元稹的器重。封敖于武宗会昌年间为翰林学士,今存其制诰20篇,“多骈散结合,且少用俚语、典故”^⑮,确如《旧唐书》本传所说“语近而理胜,不务奇涩”。这无疑是受元稹、白居易的影响,自觉地推行制诰革新,且成就突出。封敖诏文深受武宗器重,曾“赐之宫锦”^⑯,又有《翰稿》八卷流行于世,必然起到推广古文写作的作用。杜牧于宣宗大中年间为中书舍人,现今仍留存制诰百余篇,基本上以散体为主,间杂骈句,较少用典,内容充实而不浮泛,极类似于元稹的制诰文,堪称元、白之后散体制诰成就最高的作家。此外,钱珣于昭宗乾宁、光化年间任中书舍人,曾自编《舟中录》二十卷,今佚,其《序》云:“夫体正而有伦,辞约而居要。始终明白,兹所以为诰也……堂閤秘邃,不与汉魏争高下。”^⑰对于制诰文体的观念与元稹类似。其制诰今存92篇^⑱,虽为骈体,但语言古朴晓畅,内容充实,富于议论,且笔带感情,继承了元、白改革的精神。

总之,由贾至所开启的制诰文改革,经常衮、崔元翰、陆贽、权德舆等人的努力,最终在元稹、白居易手中获得成功,并一直延续至唐末。这一改革虽然并未彻底扭转以骈体撰写制诰的风气,但毕竟打破了制诰领域骈体一统天下的局面,并为制诰文带来了充实的内容。唐代制诰文改革本身既是古文运动的一项重要成果,同时也以制诰文特有的方式影响当时的文体文风,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了古文写作,扩大了古文运动的影响。

- ①⑥ 陈寅恪：《读莺莺传》，《元白诗笺证稿》第四章附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，第115—116页，第115—116页。
- ②③ 《唐六典》，中华书局1992年版，第273—274页，第276页。
- ③ 唐代制文包含诏、诰，而不包括敕文，从公文运作的角度看，以“制敕文”指代“王言之制”似更周延。但从传统文章学对文体的分类来看，自白居易《白氏文集》单列“翰林制诏”、“中书制诰”两类，宋人编《文苑英华》也沿用这种分类方法，此后“制诰文”（或“制诏文”）遂用以统称此类文体。
- ④ 詹锳：《文心雕龙义证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，第745页。
- ⑤⑬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《全唐文》，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，卷四二六第4340页，卷四一〇第4209页，卷二九五第2987页，卷六一一第6176页，卷八三六第8806页，卷二九五第2987页，卷四一四第4245页，卷四一五第4248页，卷四一〇第4209页，卷四一五第4249页，卷五二三第5321页，卷六一八第6245页，卷八三六第8806页。
- ⑥④④⑤⑤③ 权德舆：《唐赠兵部尚书宣公陆贽翰苑集序》，《权德舆诗文集》卷三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503页，第503页，第502页，第500页，第500页。
- ⑦ 刘后滨：《唐代中书门下体制下的三省机构与职权》，载《历史研究》2001年第2期。
- ⑧ 杜佑：《通典》，中华书局1988年版，第564页。
- ⑨⑦③ 傅璇琮：《唐代翰林与文学》，《唐翰林学士传论》，辽海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38—39页，第66页。
- ⑩ 傅璇琮：《唐玄宗两朝翰林学士考论》，载《文学遗产》2000年第4期。
- ⑪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《旧唐书》，中华书局1975年版，第5044页，第2594页，第2536页，第2992页，第5033页，第5029页，第5035页，第5044页，第3419页，第3766页，第4509页，第5033页，第2880页，第3766—3767页，第4333页，第4333页，第4392页。
- ⑫⑳⑥⑥⑦⑦② 朱金城：《白居易集笺校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，卷五〇第2954页，卷四八第2877页，卷五〇第2954页，卷七〇第3736页，卷二三第1532页。
- ㉑ 计有功：《唐诗纪事》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5年版，第258页。
- ㉓㉑③⑥⑦① 《新唐书》，中华书局1975年版，第5099页，第4399—4400页，第1604—1616页，第5228页。
- ③⑩ 傅璇琮、周建国：《李德裕文集校笺》外集卷三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672页。
- ③⑦ 陈尚君：《〈新唐书·艺文志〉补——集部别集类》，载《唐研究》第一卷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，第186页。
- ③⑧ 张固也：《新唐书艺文志补》，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295—296页。
- ③⑨ 杨嗣复：《丞相礼部尚书文公权德舆文集序》，《全唐文》，卷六一一第6176页。
- ④⑩ 钱珣：《舟中录序》，《全唐文》，卷八三六第8806页。
- ④② 郑亚：《太尉卫公会昌一品制集序》，《全唐文》，卷七三〇第7533页。
- ④③ 卢燕新：《唐人编选唐文总集辑考》，载《文史》2008年第2辑。
- ④⑤ 宋敏求：《唐大诏令集》，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，卷三〇第117页。
- ④⑧⑤⑥ 《陆贽集》卷一，中华书局2006年版，第16页，第2—7页。
- ④⑨④⑤ 《元稹集》，中华书局1982年版，卷四〇第447页，卷四〇第442页，卷四五第490页。
- ⑤⑩ 独孤及：《毗陵集》卷二〇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影印《四部丛刊》，第33册第124页。
- ⑤⑪ 拙作《贾至中书制诰与唐代古文运动》，载《北京大学学报》2010年第4期。
- ⑤⑨ 杨嗣复：《丞相礼部尚书文公权德舆文集序》，《全唐文》，卷六一一第6176页。
- ⑥⑩ 《权德舆诗文集》卷三三，第509页。
- ⑥⑪ 仅存《齐亢平章事制》一篇，见《全唐文》卷四八三第4934页。
- ⑥③ 参见蒋寅《大历诗人研究》，中华书局1995年版，第412—428页。
- ⑥⑧ 马其昶：《韩昌黎文集校注》文外集上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686页。
- ⑦⑤ 傅璇琮：《唐翰林学士传论·晚唐卷·封敖传》，辽海出版社2007年版，第172页。
- ⑦⑧ 分别参见《全唐文》卷八三一—八三三、《唐大诏令集》卷六三。

（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）

责任编辑 山木